

蔣天樞撰

論學

雜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論學雜著

潘景鄭署



丁丑丙戌間論學雜著

序 言

七七事變前夕，余以事至北平，一日與友同出至前門，路經關帝廟，戲掣一簽（居平多年，從未做過），其詞曰：「花發滿春臺，鵲聲報喜來，承恩辭玉殿，出鎮列三台」。又次日，余宿後門米糧庫唐立庵蘭家，夜聞蘆溝橋事變起，全城戒嚴。本思謁師、遊西山，均未獲實現，不得不匆促返汴。是年舊曆五月，長男鍾奇生。余回汴後形勢日惡，匆匆理行裝，隨東北大學遷西安。未幾妻病，醫藥育兒之事，集於余身，又須上課，夜眠僅得少許時。敵機時來轟炸，妻攜兒經鄭轉長沙隨友人避難邵陽。其後西安空警頻仍，東大決定遷川。次年春初，余與藍孟博、姜亮夫、黎東方等合租車先期入川。黎劭西夫婦事前來宿余家，亦偕行（時北師大在南鄭復校）。遷校地址定爲四川三台縣，忽憶前得詞，何其巧合！

途經漢中，黎劭西夫婦下車。余等約於陽曆三月間抵三台縣。三台，亦名潼川，漢曰郪縣，唐曰梓州。杜工部於肅宗寶應元年秋，避地梓州。其年冬，自成都移家梓州。迄廣德元年仍寓梓。有《九日登梓州城》、《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及《春日梓州登樓》、《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上牛頭寺》、《登惠義寺》、《上兜率寺》、《涪城香積寺官閣》、《陪李梓州泛江》諸詩。《去蜀》詩言：「五

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蓋以移家後計之。廣德二年初，故人嚴武，再度以黃門侍郎出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乃歸成都。在嚴武幕中，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工部以此。

初至三台，無家累，孤身居旅社中。乃函流離豫南之弟天格，至湘接嫂姪入川。余暇則偕友泛舟涪江，或登東山吟嘯，或上牛頭山寺拓碑。每誦工部「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之句，不自知其淚下也。舊曆春暮，格返抵渝，不願來三台，送嫂姪登車後，獨留渝。余不獲已，驅車至綿陽迎妻兒，時戊寅初夏也。初借住方家街，繼乃遷東門內陳家巷新居。所居爲新建工字形樓房，余居中，右鄰物理系胡乾善，舊友。左鄰法學院王某。樓外繞以垣，東南隅有角門，後有大門通出入。所居爲三樓三底，（後面廚房三間，兩間砌爐竈，一間住女工）妻居樓下，余居樓上右偏，藍孟博居左。時蕭一山長文學院，藍孟博主歷史系，金毓黻、丁山、蒙文通任歷史系教授。姜亮夫主中文系，余與高晉生、潘重規任教授。亮夫與陶秋英畏空襲，賃居北壩袁家，潘重規亦繼至。

居陳家巷之舊曆十一月，次兒鍾霖生。次年（己卯），空警日多，入夏尤甚，余凡遇險多次，以本年夏爲最。窩樓之左側即東城垣，垣內皆窪地，所居樓在陡坡上，下距窪地丈餘。院外迤南田中，偏布防空壕，有警則妻携兒急避其中。某日，瞥見窗外敵機已至，急下樓出東角門躍下窪地，則保姆負霖兒及英文教師殷葆臻已先在。背倚坡地上視，敵機已在投彈，先一彈稍偏西，響震劇烈，次一彈，頂空直下，懼難免，幸少偏東落城牆外。出見迤西民家房全燬，後聞全家避難，僅一兒匿櫃牆之間獲免。時妻已携兒自壕出，震劇，兒鼻血流滿面。妻遂携兩兒逃避鄉村，余獨留城居。

庚辰春，陸侃如夫婦來東大，原賃房不敷用，晉生勸我將住房讓出，闢爲單身教授宿舍，不得已

遷居後小灣肅一山住宅，合住（門外即一教會醫院，僅一英國老太婆，主接生）。遷居後，每遇空警，學生時帶兩兒外出躲警報，因食不潔物，舊曆四月，霖兒病，越四日，琦兒亦病痢，小城市無醫藥，窮困，又無力攜兒外出就醫，教會醫院為霖兒打針，無效，延至四月下旬霖兒殤。余與妻終日徬徨，兼風雨淅瀝，日對病危之兒，無計可施。五月初一日晚，琦兒亦殤。倘不移家，未必至是。天乎！慟哉！

友人於西郊新建平房三間，地名水觀音，距城六里許。商得友人同意，遷焉。是年外甥朱子方由西北大學畢業，亦來三台，一山為介於鹽務局工作。壬午年舊歷三月廿三日庚申（陽歷五月七日夜十二點生於城內教會醫院）長女生，初呼為大娃，後改名鍾垣。空警已少，九月由鄉遷回城內羅宅。十月病，初住教會醫院，子方白日上班，夜來侍疾，時余病淹久而家貧。次年春回家，改服中藥，經夏漸痊復。來三台已六年，連殤兩兒，余又大病幾死，亟思易地，友人介紹至北碚夏壩復旦任教。癸未始（一九四三年）秋，隻身乘車經遂寧至青木關。稍休息，乘船轉北碚至復旦。次年春，外甥朱子方護送妻女乘船來復旦。天格因介子方在編譯館工作。甲申夏，子方與肄業江蘇醫學院之孟憲英在北碚結婚。冬十二月初一日次女生於北碚江蘇醫學院，初呼曰二娃，後名之曰次塤。返滬後改名鍾垣。時甥媳孟憲英在醫學院即將畢業，育兒及護侍妻事，皆憲英任之。并接鍾垣到他家暫住，以我須教課，無力照顧小兒也。

乙酉八月，日本投降。值江漲，院內可行船，所居水深沒腰，遷居山坡上民居，間有人露宿，與鄰居同事等相對苦笑。雖慶勝利，難解愁顏。丙戌夏，復旦謀復員，時有遷徐遷錫之命令（兩地任擇其一），終遷滬。交通工具之權操芮某手，飛機票不可得，最後畀以川陝公路聯運專車票，經遂寧、

成都，再度歷綿陽、廣元北行出川。携兩幼兒，食宿兼困，余又未健復，時以奶粉充飢。與入川情況又自不同。長途甚憊，抵西安稍憩，道斷不通。借住西北大學。丙戌年秋，覓得飛南京機票一張，隻身至寧，留兩周後返滬。

居川之日，嘗私署苦酒齋，借夢室，藉志私情，又嘗私署儀顧堂，志景慕。今追述十載流離概況，獨取「丁丑丙戌」為題，志難忘之隱痛也。

茲編錄文，以在川所作為主。復將少作三短文冠於前，稍後文兩篇附後。藉徵前半生踪跡。出川之年為丙戌，公歷一九四六年也。

解放後，余以知命之年，重當小學生，雖終歲咿唔，日日學習，積習深而進步少。無暇讀書，悠忽廿餘載。學既無成，業又不進，長日蹉跎，時深慨嘆。一九七七年以後，始得重理舊業，年日邁而學益荒，回思往事，如歷夢境。每誦昔賢「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之語，時為之感慨洑瀾也。

一九八二年夏識

目次

擬屈原橘頌	一
書年華錄後	二
煙嶼樓集《記杭堇浦》辨誣	四
漢賦之雙軌	十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傳》校記	三三
《三國志·吳書·虞翻張溫傳》校記	五三
周詩箋說	五九
論顧亭林	八三
諸葛玄事跡考	一〇五
周代散體文發展之趨勢	一九
商書盤庚篇證釋	三〇
商書盤庚篇校箋	三七一
詩大明「嬪女維莘」考釋	一九八
釋邶風「日居月諸」	三〇
「楚滅越在懷王二十三年」說平議	三五

擬屈原橘頌

惟后土之性特，誕嘉木兮南國。信稟性之有殊，獨貞固而不移。在夫人而有然，詎卉木其無奇。皇天平分此九土兮，橘獨生夫南方。雖無紛華之可悅，而有獨異之鋒芒。稟凜秋之勁氣，抱溫潤之和光。既青赤之順序兮，復經緯之中藏。雖文章其爛漫兮，蘊精英而不揚。彼繽紛其變易兮，此獨守其故常。求貞固於晚歲兮，心抑鬱其憂傷。夙夜惕其審慎兮，嬉好脩而莫忘。豈不欲隨地以居處兮，乃恐其化而爲枳也。豈不欲隨俗以南北兮，乃恐其笑以爲詭也。嗟嗟！心不堅兮和同，志不立兮首鼠。既墜身以招尤，徒勞勞兮自苦。思夫君兮太息，慎斯植兮南土。

書年華錄後

年華錄一書凡四卷，署鄞縣全祖望紹衣輯。近商務印書館得舊本，重爲刊印，殆以爲不見於著錄，必謝山先生失墜之書也。去歲北平中海圖書館亦購得一原刻本，以爲得所未見，急假觀之，初亦意爲謝山早年之作，滄田錄之流亞，諦審之，知非謝山所著。謝山著述之見於友好疏記，門弟子所述，及鄞志藝文志所列者，已大都無遺，而董覺軒修鄞志時，搜集尤力，即書名之偶見他文中已一字無存者，亦爲備載。是書既爲舊刻，獨未言及。謝山生平不喜佛氏，於晚明遺民之逃禪者，只著其大節，其嗣法事則爲微詞以囊括之。是書稱舉佛生事，則津津樂道焉。卷首有自序一文，謂丙子夏居金臺時所輯，考謝山生於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於乾隆二十年乙亥，生平竟未遇一丙子，其一爲卒後之一年，其一爲康熙三十五年，而謝山尚未生也。原刻本序文爲手寫字體，後并鈐有謝山印，則又不應有誤寫誤刻，而序文中之傷逝年華，感懷榮枯，則又謝山生平所不樂道者也。即此數端，則是書出於僞託甚顯。此殆謝山身後著述稍見於世，門族零落，手稿展轉不可問，無知者雜撰此書，託之謝山，而又并謝山生卒年月不一考查，則亦拙於作僞者也。謝山遺著，文集有竊據之疑獄，水經注有私奪之鉅案，今又有此冒託之僞作，昔賢身後著述之厄，殆莫謝山若矣。

此文寫於一九三〇年，即民國十九年春，余在北平時。是年九月，爲生活所迫，出關至瀋陽，任教北陵前之遼寧第三高中。時東北大學友人創辦《重華月刊》，因以此文畀之，刊於民國

二十年五月《重華月刊》創刊號。是年九月，「九一八」事變作，隻身逃回北平，書籍衣物及所携家藏先代長物盡喪失，僅着舊長衫一襲而歸！此後歷盡艱困。閱時既久，久忘有此作。一九五八年六月，陳守實兄檢出《重華月刊》一冊相貽，翻閱如溫舊夢。今茲守實兄久歸道山，余則閱歷滄桑，視息人世。姑存此短文，聊徵往迹，因并識之。壬戌夏五，樞識於上海復旦宿舍。

煙嶼樓集《記杭董浦》辨誣

晚清徐柳泉時棟，全謝山之鄉後學。他的出生，謝山門下董小鈍、蔣樗菴都已下世，而與陳勸董沛鄭勳同時。集中與陳勸倡和之作尤多。同縣黃定文，小鈍樗菴之弟子，而盧鎬之婿。徐作《蔣秀才墓版文》（樗菴子）在道光十五年，文中言及「吾鄉黃東井」，而集中不見與東井往還之作。柳泉晚年曾主修鄭志。他詩文中間有語及「全太史」者，尤以《記杭董浦》一文，言謝山與杭董浦交誼事，爲後世所稱道。董浦之「賣友」，幾成定論。余嘗從各方面考察，其文所記實不可信。茲先引《煙嶼樓文集》卷十六《記杭董浦》文中有關部份（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所記略同。陳爲徐弟子。）如下：

鎮海夏君佩香讀《道古堂集》至《鮎埼亭集序》而疑之，曰：聞董浦與謝山爲執友，今其文乃抑揚吞吐，若有甚不滿於謝山者，何也？一日，以質諸予，予嘆曰，甚矣君讀書之精也。則請爲君詳言之。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爲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譚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間言也。既而謝山先生應粵東制府之聘往主端溪書院，董浦同時在粵東，爲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以時物相餉亦峻拒之。而董浦則捆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僚屬，用重價強賣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爲人師所宜爲者，不聽。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董浦。馬氏巨富，爲董浦所嚴事，聞

之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謝山既卒，其門弟子如蔣樗菴、董小鈍諸公，念其師執友莫董浦若者，乞之銘墓，董浦乃使來索遺集，諸公與之，久之無報章。疑之，屢索還遺集，終不報。又既而董浦所爲《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公視其目有此序，忻然讀之，若譽若嘲，莫解所謂，又細繹之，則似謝山有敗行也者，皆大驚怪。又取閱其他文，則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於是乃知董浦之賣死友，而不知其所以賣之之故。既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菴，始恍然大悟。（下略）

因爲要辨別真實，不得不彙錄文中的主要部份如上。徐氏自稱所記本於蔣樗菴，而蔣氏「手記董浦負謝山始末」則見於徐氏所藏鈔本《鮚埼亭集》卷首，其真實性如何，未見原鈔本《鮚埼亭集》，無從懸揣。總之，徐氏既記「竄謝山文爲已作者六七篇」，又云「余讀鮚埼文不熟，不能知董浦所竊者爲何篇。」這一問題遂無法確切證實。就董浦學力及其素行看，似不至墮落到「公然剽竊之爲己有」的地步，而且兩人行文風格完全不同，董浦何至靠「剽竊」他人文六七篇來傳世？即使盡去「道古堂文」，董浦其他著作仍可流傳不朽。

謝山十八歲那年（康熙六十一年，公元一七二二年）初出游至武林，交杭董浦、厲樊榭等，見《鮚埼亭集》卷十九《龔明水墓志》，是後常至杭。雍正七年冬，杭董浦、陳句山、梁鄉林等皆去北京，次年春，謝山亦北上。當雍正九年浙撫聘杭董浦、厲樊榭修浙江省志時，厲樊榭、杭董浦千里遺書至京，求借謝山所藏有關四明舊志，謝山遣使請於其父，盡將所藏宋本、元本及鈔本宋元明舊志十種，悉送省志局。見外編卷三十五《跋寧波簡要志》。此事既表現杭、厲對老友的信託，也說明謝山的公而忘私。董浦有《詞科掌錄》，中云：「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

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可見董浦對謝山之敬重。此後直到全、杭兩人同時入粵，他們間的友誼都是融洽的，以三十餘年的老友，即令曾發生過小的芥蒂，何至賣老友於身後？朋友間有不同意見是常有的，至因小嫌而厚誣死友，却是歷史上少見。

謝山門下蔣學塘樗菴、董秉純，確對董浦有所怨望。謝山未卒前，曾令人將甫編定之《結埼亭集》五十卷（八十巨冊）送交維揚馬氏秋玉、佩兮兄弟，此集後歸董浦，樗菴小鈍二人函索，未見還。此結怨之一。小鈍曾函董浦請為謝山作墓志，董浦未應，此結怨之二。案：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間，早已發生過戴名世南山集大獄。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又發生過呂留良大獄，并曾頒布《大義覺迷錄》於天下，謝山友人王立甫也以牽連被逮入京。凡此，皆董浦所親見者，乾隆初年已下令徵訪遺書，而乾隆三十七年銷書毀書，又當為董浦所耳聞。在董浦詩的《送老集》中，有題為「向披初學集，狂詆本朝，輒焉髮指。新奉諭旨，錢謙益詩文概行焚毀，不勝歎躍，敬紀一律」詩，則其深藏謝山集而不出，或出於愛護之意。而其不敢表彰謝山志行，豈以血氣既衰，有所畏懼之故歟？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董浦、謝山同時入粵，舒瞻《蘭藻堂集·董浦謝山同膺粵東掌教之聘不及握錢詩以送之》詩，有句云：「江城相訪惜離群，夢去榕陰路不分。郭李同舟行有伴，山川接席喜論文。」謝山所就者，廣東肇慶之天章書院山長（亦稱端溪講院）。董浦所就者，為廣州之粵秀書院山長。次年三月間，謝山病，董浦渡江到肇慶視疾。《嶺南集二》有《問全山長祖望疾》詩二首，其一云：「為汝淹遲久，荒江少釣篷。圍棋深雨裏，橫榻晚春中。疾病餘生幾，憂虞所歷同。葉公（自注：希元）頻過酒，猶有古人風。」這時謝山曾以端石贈董浦，《嶺南集三》有《全山長贈端石四片，歸鑿為硯，一以贈吳元治，一以贈陸世貴，留其二以自娛。詩以代銘，并寄山長端州》詩，

見此時兩人交誼。謝山因病於乾隆十八年秋離肇慶返里。中間雖曾一度赴場，旋於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五）七月初逝世。而馬秋玉曰琯，則已先謝山若干日前卒。董浦則於乾隆二十年深秋離粵北歸，故詩中有「綠酒黃花別緒深」之句。他沿途登臨遊憩，《嶺南集五》有《長至日廣信（上饒）舟中》詩，是其經廣信時已在乾隆二十一年夏。琯浦之抵杭，當即在當年夏季。《閑居集》有《閏月九日展重陽於吳山》詩，乾隆二十一年丙子，閏九月。此時謝山已前卒兩月。是董浦到端州看謝山病時，爲兩人間最後的聚會。在這種具體情況下，竟會產生「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董浦至，馬氏秋玉昆季甚詰責董浦。馬氏巨富，爲董浦所嚴事，聞之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知也。」一些謊言，實屬怪事。事實上董浦再到揚州時，謝山秋玉都已早作古人。

最後再談《道古堂文集》卷九《全謝山鮎埼亭集序》這一主要問題。首先，徐記中每用「既而」作轉語，如云「屢索還遺集，終不報。既而董浦所爲《道古堂文集》雕本出矣，諸公視其目有此序，忻然讀之。」考《道古堂文集》刊成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八月，見集末附記。書之流通當在乾隆末年。其時謝山之卒近四十年，董浦之卒也已二十年，下距《鮎埼亭集》之付刊，已爲時不遠。由此可見杭氏集和全氏集的流傳，時間相去很近。其次，董浦當在由粵北歸後始知謝山之死，其爲老友遺集作序，理應流露出對老友身後之情。今觀杭序，不特絕口不言其事，且無絲毫哀念故友表現。所謂「諸公」者何以不涉想及此？考《道古堂文集》王曾祥舊序，雍正十二年甲寅夏，董浦曾編定舊作百餘篇爲集。雍正十三年，謝山在京時，亦曾編定舊作爲《鮎埼亭集》。《鮎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答姚憲田書》：「日者摺據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參全文）書中勸憲田應鴻博試，是該集在乾隆元年時業已編定。《道古堂文集》中之《鮎埼亭集序》實際上是乾隆元年董浦到京以後之作。董小

鈍請求時，并未曾作序。且《道古堂文集》之《鮎埼亭集序》與《鄭筠谷詩鈔序》、《蓮塘詩序》、《春暉堂詩鈔序》、《送袁子才序》等相先後，皆乾隆元年、二年間所作。董浦之爲人，性談諧，故耿國藩撰董浦象贊（見集端），有「不夷不惠，玩世不恭。東方而後，僅見此翁」語。龔明水鑒爲董浦作《橙花館集序》也說：「吾友杭子大宗，言不純師，學不純德，有類東方先生之爲人。」董浦敢於在皇帝面前講自己的職業是「買賣破銅爛鐵」，也正是東方先生口吻。謝山以受時相張某排擠，不得參預鴻博試，而董浦在鴻博試中高中，以談諧之人，當志得意滿之際，其爲謝山作《鮎埼亭集序》，不能悉以莊語出之固宜。且董浦長謝山十歲，序文中時流露長兄訓誡小弟之口吻，此固具體環境使之然。姑就個人對杭氏序文的理解來看，序有「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這正是正面告誡謝山的話。至於下面「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郭史廓，壹切屈服，折楊皇耆，昇歌於清廟。諸於綉褹，被絃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啞其笑矣！」一段，當別有所指（頗疑即指壓迫謝山之張某）。此序先稱道謝山的鄉學淵源，繼即以近於揶揄的一段話引起下面諷刺那些官僚達人、廟堂權貴的牢騷話。實際上是代謝山鳴不平。這些話在當時謝山是能體會董浦深意的。序末「謝山志銳而氣充，糞搜章句小生。獨以仆爲鹽石，僕雖重怪，其得已於言乎？」的一段話，所以勗勵謝山之意甚厚。並沒有什麼「若譽若嘲，似謝山有敗行也者」的意思。

徐記的後半還談到戴震和全校水經注問題，王觀堂先生已在《孫潛夫水經注殘本跋》、《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及孟森心史《擬梁曜北笈段茂堂論戴趙二家水經注書》各文中已詳論之，這里就不多談了。

一九三一年，余在瀋陽，九一八事變後逃回北平（當日舊稱）。時至北平圖書館校補舊作謝山年譜，并草謝山著述考。此文初稿，即「著述考」中《鮎埼亭集》後之附篇。一九七八年據舊稿草成此篇。一九八〇年曾刊布於《學林漫錄初集》。今取附編於舊作前，爲識顛末如此。至增補之謝山年譜舊稿，凡四巨冊，存謝剛主處，久索未歸，云已付之故紙攤云。傷哉！

漢賦之雙軌

余草斯篇之動機有四：一、漢代爲賦體發展之第一階段，而文學離開一般學術自成巨流，亦自漢賦始。二、漢代以後文體日繁，多與賦異體同氣，由賦可以通其郵。三、由於古代四言詩與楚辭之兩種伏流，形成漢賦之兩派，其遞相倚伏盛衰之關係，錯綜複雜，須先於賦中闡明其因果。四、賦之地位確定而後可以考見漢代文學之特色與建安後文學之新陳代謝，魏晉後之遞變日新。爰本斯誼以言漢賦。

一 致語

賦在中國文學中，體格最爲特殊；以之廁於文，則句偶而韻，以之廁於詩，則又不能相容。古代散文，由雜記事與言，發展而爲記事之史，記言之諸子，與戰國策士之議論。古代之詩，由謠謳發展而爲以四言爲主體之「詩」，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相雜之「辭」。漢代之賦，殆類於文與詩間之橋梁，左行則可通於詩，右行亦可達於文，吸收詩之成分多者則近於詩，吸收文之成分多者亦近於文。故賦之爲體，實介於詩文之間，而其以抒情爲主者則毗於詩，以寫物爲主者則毗於文也。

左太冲序三都，挈仲治序流別，劉彥和《詮賦》，於賦之源起，皆舉「詩有六義，其二曰